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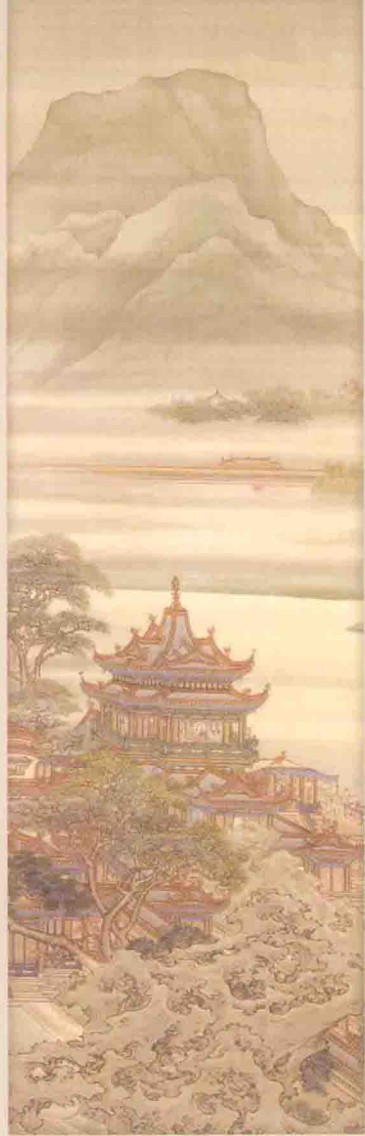
雪隱文丛

主编 释光泉 陈洪

民初作为方法

——文学革命新论

宋声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臺灣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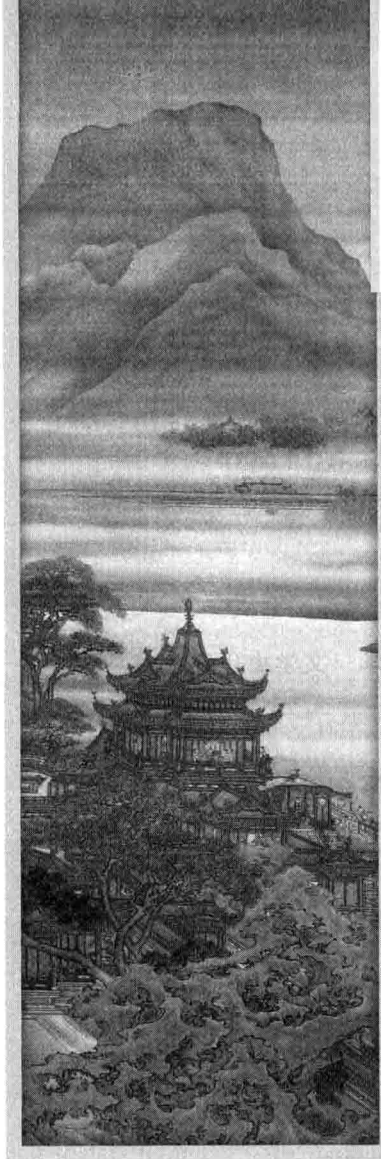
主編 釋光泉 陳洪

民初作為方法

——文學革命新論

宋声泉 著

南開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初作为方法：文学革命新论 / 宋声泉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1

(灵隐文丛)

ISBN 978-7-310-04748-2

I. ①民...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
—民国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7574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290×170毫米 16开本 19.75印张 2插页 328千字

定价：45.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灵隐文丛”序

光 泉

灵隐寺是中国佛教著名寺院，也是江南著名古刹之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北武林山下，始建于东晋时。据《淳祐临安志》记载，东晋咸和元年（326），印度僧人慧理来此，见武林山水俱佳，感叹此地“多为仙灵所隐”，遂建了此寺，迄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

灵隐寺是江南最古老的寺刹、东南第一禅院，此寺创建后，浙江地区始闻佛法。唐代灵隐寺是华严宗的道场，盛弘江南的华严学。五代、宋时，灵隐寺进入到全盛时期，当时寺内有房1300余间，僧人3000余人。其中不少名僧居住于此。北宋最有名的禅宗云门宗僧契嵩和尚就在此寺担任过住持。南宋朝廷偏安，以杭州为都，皇帝曾亲自来寺事佛，因此它居宋代“五山”之第二位。元代，灵隐寺渐趋衰落。明代得以中兴。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南，必来灵隐寺进香题词，故香火旺盛。

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灵隐寺遭受数场大火，无力恢复，寺院残破不堪。50年代以后，灵隐寺经过数次整修，已具一定规模。如今的灵隐寺，是灵隐风景区中最重要的景点，沿着山涧的石板路就可到达寺院山门。寺内建筑错落有致，环境干净整洁。大雄宝殿高33.6米，面宽7间，进深四间，宽敞宏大。殿内的莲台、佛像、须弥座总高24.8米，以24块樟木雕成。佛像高19.6米，仅次于承德普宁寺的千手千眼观音木雕像。弥勒殿的韦驮像也是用整块樟木雕成，为南宋遗物，距今也近千年了。

“灵隐文丛”序

“灵隐文丛”是灵隐寺文教基金支持的学术项目。

灵隐寺为海内外宗仰的佛教千年古刹，也是影响广远的江南文化重镇。此番善举是这座宝刹致力社会文化建设的又一大手笔。

佛教历来重视智慧。佛陀本义即为“觉者”。僧肇讲过：“佛者何也？盖穷理尽性，大觉之称也。”历史上的佛门大德于世界人生之实相、真谛思考甚深，亦多有启迪民智之举。而自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以来，中国的佛教界对于社会的文教卫生殊多贡献。赵朴老当年传承这一思想，又于教育、学术着力尤多。

学术，天下之公器也。学术研究是否活跃，学术思想是否深刻，学术水准是否精进——这些几可视为一个民族精神境界、精神活力的重要标杆。灵隐寺光泉大和尚秉大眼界、大胸怀，关注学术，对青年学者不设任何畛域予以大力扶持，彰显出佛门大德超脱凡俗的智慧与慈悲。

有幸得到这一扶持的青年才俊，当以此为一新起点，增一新动力，于学术之境有持续之开拓，于人生之境有不断之精进。唐人题咏《灵隐寺》有名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期待入选本文丛的著作都能有如此的气魄、格局，更期待文丛的作者在学术人生中都能常保如此的眼界、胸襟。

助成文丛善举者，还有黄夏年先生、孙克强先生、王红蕾女士。

陈洪 癸巳处暑于南开园

民间流传，灵隐寺的香火很旺，抽签亦很灵，故吸引四方信众前来灵隐寺参观与进香。倚于武林的山清，西湖的水秀，灵隐寺的文化也很有特色。此寺自建立后就成为佛教文化的传承所，文人的集合地。历代著名的官员文人，游历灵隐寺，均留下墨宝。如宋代苏轼曾为杭州知府，多次到灵隐寺进香，描绘该寺“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相哺”的盛况。清代康熙、乾隆下江南也来灵隐寺，并写下诗作。现在凡到杭州的客人，也多至灵隐参拜进香。

杭州城从古到今有过不少寺塔，仅据1948年的统计就有大小寺庙516所。灵隐寺是杭州佛教的名片，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代表。因为寺院文化悠久丰富，不仅代表了杭州佛教文化，而且反映出佛教文化的精神特质。佛教文化分雅、俗两种，这两种文化在灵隐寺则得以体现：就雅文化而言，宋代灵隐寺住持契嵩和尚是中国佛教禅宗学术的大家之一，其著述的佛教学术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宝库的重要资料。就俗文化而言，我们最熟悉不过的颠僧济公和尚是在杭州灵隐寺出家的，他衣衫褴褛，举止疯癫，嬉笑怒骂，诙谐幽默，然亦正亦邪，嫉恶如仇，劫富济贫，拯救黎民百姓于疾苦之中，故深受民众热爱。民众认为他是“降龙罗汉”转世，亲切地称他为“济公活佛”。作为自宋以后南方佛教文化的代表之一，灵隐寺高僧云集，且多为知识渊博，引领一代风气的佛门领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宛如浙江省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美丽的西子湖畔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客，谈到这块美不胜收的天堂宝地，就不可能不谈到灵隐佛教对它的贡献！

灵隐寺既有悠久丰富的文化历史，现在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曾与天津南开大学合作，发放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现在灵隐寺又与南开大学文学院合作，共同创办“灵隐文丛”，旨在推动佛教学术活动，加强灵隐佛教与文化研究，为当前传统文化复兴与灵隐寺佛教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去年灵隐寺召开了“灵隐寺与中国佛教：纪念松圆崇岳禅师圆寂88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即将付梓。藉此因缘，将《论文集》作为“灵隐文丛”首发之书，以报四恩，以奉学者。

是为序。

2013年8月22日于灵隐寺方丈楼

南开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nkup.com.cn>

投稿电话及邮箱: 022-23504636 QQ: 1760493289
QQ: 2046170045(对外合作)

邮购部: 022-23507092

发行部: 022-23508339 Fax: 022-23508542

南开教育云: <http://www.nkcloud.org>



App: 南开书店 app



南开教育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天津市多媒体教育技术研究会共同开发, 主要包括数字出版、数字书店、数字图书馆、数字课堂及数字虚拟校园等内容平台。数字书店提供图书、电子音像产品的在线销售; 虚拟校园提供 360 校园实景; 数字课堂提供网络多媒体课程及课件、远程双向互动教室和网络会议系统。在线购书可免费使用学习平台, 视频教室等扩展功能。

目 录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只有晚清，何来“五四”？	1
二、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16
三、相关研究状况及文献综述	22
四、研究目标、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	30

第一章 消逝的界标：“民元”在文学史叙事中的百年浮沉

.....	34
第一节 早期文学史中“民元”的“缺席”与“在场”	35
1.1.1 “文学史”的发轫及其书写限制	35
1.1.2 “国朝”的隐退与“民元”的在场	40
第二节 民国视阈中的“文学革命”	43
1.2.1 “民元”界标的初生	43
1.2.2 民国视阈的流行	47
第三节 渐行渐隐的“民元”记忆	51
1.3.1 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历史遮蔽	51
1.3.2 “民元”解构的背后	53
第四节 一元史观下的“民元”批判	57
1.4.1 新民主主义史观的注入	57
1.4.2 遗忘的迅速与复归的艰难	59

第二章 共和初肇：小说走向现代的制度性支持 66 |

第一节 从帝制到共和：小说文运兴起的官方背景	67
------------------------------	----

2.1.1 “小说”成为禁忌	67
2.1.2 “闸门”的开放	73
2.1.3 国文教科书中的“小说”	80
2.1.4 文学史课堂里的“小说”	84
第二节 历史浮出的背后：民初文坛与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	92
2.2.1 鼓励与扶助	97
2.2.2 推介与标榜	100
2.2.3 域外新知的输入与启迪	104
2.2.4 质疑之音与女子新声	108

第三章 返回起点：重构文学革命的“生成” 113

第一节 《青年杂志》与“新”文学	114
3.1.1 独树一帜的《青年杂志》	114
3.1.2 一样的旧体与不一样的心情	122
3.1.3 写实主义与文学革命	129
第二节 1917：文学革命的发难与响应	141
3.2.1 新文学家的现身说法与历史压抑的生成	142
3.2.2 为“折衷”正名——以白话文学的讨论为中心	150
3.2.3 “改良”与“革命”的纠葛	164

第四章 “运动”的由来：新文学合法性建立的再审视

	181
第一节 重估《新青年》同人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	182
4.1.1 漂浮的能指：作为概念的“鸳鸯蝴蝶派”	182
4.1.2 普遍的不满与共同的诉求	184
4.1.3 美丽的“帽子”与历史的误会	188
4.1.4 一概而论的误区	192
第二节 “林纾败北”前后的文学革命	195
4.2.1 被神话的“双簧戏”	196
4.2.2 重访林纾与《新青年》同人的结怨之路	208
4.2.3 成为公共舆论的“文学革命”	224



4.2.4 共和话语：“林纾败北”的根源	241
结 语	260
附 录	264
一、《新青年》第二、三卷所载与文学革命相关的文章	264
二、对“八不主义”的回应	267
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302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只有晚清，何来“五四”？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因时异而嬗变。史学大师蒙文通曾借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语，谈论历史研究的要义——观史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因为“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①。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革命便堪称不多见的“大转折处”。

如果摒弃以今律古的认识方式，可以看到传统的文学变革更接近于文体内部的衍生，诗、文、小说和戏剧各有其发展的轨迹；尽管文体间亦互有影响，但具有统摄各文体意义的“文学”概念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因为当今通行的“文学”概念并非由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得，其起源于英文“Literature”经日译以汉字“文学”^②定着化后重新返回中国的汉字反向传播。^③按乔纳森·卡勒的说法，这个原本指称“著作”或“书本知识”的“Literature”，具有其现代含义——“文学”的时间才不过二百年。^④尽管“文学”二字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其出现新内涵肇始于晚清，而产生普遍影响并在知

① 蒙默编，蒙文通生平和学术——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

② 读作“ぶんがく”。

③ 可参见[日]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与余来明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举隅——以“文学”概念为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④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1. 亦可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中对“literature”的梳理，第268~274页。

识建构层面完成现代转型应归功于文学革命。^①

今人不仅对现代“文学”概念的生成渐渐遗忘，对文学语言的使用也习焉不察。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上世纪40年代便已指出：“从‘五四’到现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②现代中国文学语言的奠基亦源自文学革命。甚至可以说，与中国历代的文体变革相比，文学革命之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空前的。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演进中，文学革命始终作为需要被对话的核心事件。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延安文艺道路的形成，抑或50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统治地位的全面建立、80年代“五四”文学传统的复归，对文学革命的重新阐释，在现代中国的不同时期，几乎都对文学的新走向产生过内在的驱动力；甚至目前，随着网络技术与文学写作的结缘，部分学者认定新媒体的变化已然或将要引发新一轮的“文学革命”。^③由此，对文学革命的深入探讨不但具有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即可为当下的文学发展走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学革命研究之举足轻重的位置不言而喻，甚至关乎现代文学的学科之本。不过有意味的是，首先对文学革命做以完整历史叙述的恰恰是文学革命的发起者。正如陈平原所言：“从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到193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再到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仅仅十几年时间，‘五四’新文化人已经完成了‘盖棺定论’，包括运动的历史定位以及著作的经典化过程。”^④后世研究者的叙史思路与话语策略都难免受制于当事人的证词。

不仅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被视为异类而得不到重视，即便是曾

① 可参见李春的《文学翻译如何进入文学革命——“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

②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258。另可参见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该书第一编综述“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大势，第二、三编分别论述“五四”以来词汇与语法的发展。

③ 如周海波的《新媒体与新的文学革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与李宗刚的《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在孕育》（《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皆持此类观点。

④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68。



经作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指导纲要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文学革命性质的判定亦在“文革”结束后遭到质疑。以许志英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突破政治禁忌，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诉求下，认定文学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重估胡适等所谓右派分子在文学革命中扮演的历史角色。尽管这种观点遭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但亦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共鸣。^① 随着“左倾”意识形态的松动与“重写文学史”热潮的兴起，附庸于政治史视角下的文学革命的历史书写虽被颠覆，却又重新为新文学创立者的自我总结所笼罩。

然而，就在对文学革命性质的讨论尚属敏感话题的同时，新的研究策略破茧而出。据钱理群的回忆，“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一个动因便是受到了当时许志英的文章及其争论的提醒，“在‘清污’中好像是胡乔木对这篇文章表示了不满，于是遭到批评，就弄得学术界很紧张……这件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私下里都在讨论，我们是赞同许志英的观点的，但都觉得许老师太老实，不应该这么直接去碰，所以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把时间从‘五四’提前，这样就把这个问题消解了”。^② 为了摆脱“党史”笼罩之下对现代文学学科的限制，从而避开对官方意识形态不允许的“文学革命”性质等话题的讨论，“晚清文学”研究作为突破口之一开始被重视起来。

由于受“五四”新文化人有意无意地贬低甚至抹煞晚清文学的影响，建立在以“五四”范型为基础的现代文学研究对晚清时段在很长时间里都缺乏应有的关注。尽管近百年来近代文学学科曲折中亦有所发展，但受制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束缚，晚清始终被看作文学史上的过渡时期。反倒是身为海外汉学家的米列娜早在1980年就希望在晚清小说的研究中“寻求中国现代文学之根”，以便“五四”运动不被人“误解为一个与中国的过去断然分隔的文学事件”。^③ 海外汉学家看重晚清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的研究思路恰逢其时地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了影响。陈平原曾坦言：“在北大读书，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即得益于米列娜主编的 The Chi-

① 参见《“20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录》。该文作为“附录一”收入杨庆祥的《“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20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录。

③ [捷]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中译本自序。该文集的英文版即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① 他通过对 1902—1927 年近 800 篇（部）中国小说的抽样分析，认为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转变依靠于晚清小说家与“五四”小说家两代人共同完成。^②

在发现“晚清”的过程中，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问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因为他对晚清小说被压抑现代性的挖掘，不仅要强调晚清之于“五四”的先导作用，更是“感叹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视野，是怎样错过了晚清一代更为混沌喧哗的求新声音”，所以他认为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③ 王德威本意“不把‘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作是一个因果”，但其对“五四”典范的颠覆性论述，为重新寻找现代文学的起点提供了强大的话语资源。

几乎与学界重访“晚清”同时，对同样为新文化人所蔑视的“鸳鸯蝴蝶派”的研究，亦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启，并渐成兴盛之势。以范伯群为代表的一批学人，通过细致的资料整理、作品分析以及对其历史地位的再评价，使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研究对象的学术意义浮现出来。特别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最初的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流派的考察，调整为与新文学的精英话语对峙的“通俗文学”的建构，并提出了“双翼齐飞”的现代文学史观。^④ 而在重建现代中国通俗文学史的过程中，作为源头的“晚清”亦得以放大，甚至尊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即“将它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换乘点’的鲜明标志，它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点”。^⑤

晚清文学研究在近 20 年间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不断地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五四”范型进行着质询，成绩十分显著；但相伴而来的是对文学革命的意义的大肆消解。于是，亦有诸多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前移表明了怀疑的态度。既有王富仁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商榷，重新论证

① 陈平原。追怀米列娜。文汇报，2012 年 11 月 14 日。

②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③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6。

④ 关于范伯群治学思路之变迁及其学术贡献，可参见范伯群的《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及其自选集《填平雅俗鸿沟》（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年）与陈思和、王德威主编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共生体系的新思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中的第三部分“范伯群先生学术思想研究”。

⑤ 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

着“五四”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必然性^①；又不乏与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对话者，如“晚清是晚清，‘五四’是‘五四’”^②、“没有‘五四’，何需‘晚清’”^③等命题的提出，即是源自对文学革命历史地位的捍卫。面对批评，王德威在反复重申本意时，也屡次表示“乐于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他的依据是“五四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都是重新看晚清的”。^④与王德威强调“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丰富性与辩证性不同，陈平原感慨于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视野使得他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⑤

诚然，“用五四来看晚清，用晚清来看五四，在不断的对话状态中，理解各自的价值以及局限”^⑥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推崇的，但基于历史视野将从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变革作以整体描绘的探析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只纠缠于“晚清”与“五四”的两难之中，试图将这两个时段直接勾连的尝试，在某些方面能够阐述清楚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恐怕难免出现问题。因为夹在“晚清”与“五四”之间，尚有“民国初年”（后文简称“民初”）这个十分特殊的时段存在。

遗憾的是，国内对民初文学界的理解很长时间停留在视其主要由堕落的南社文人、反动的清遗民诗文、逆历史潮流的鸳鸯蝴蝶派与黑幕派等构成的认识水平。1912年至1919年的中国文学不仅不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甚至被视为文学革命前最黑暗的文学时代，民初与“五四”被人为地划出了鸿沟，有研究者称：“现有的近代文学史往往谈到民元即戛然而止，虽说在部分章节里偶也兼涉民元后的一些资料，但零零星星，不成系统，实际上从民元到‘五四’前夕成为一段空白，与现代新文学史并不衔接。”^⑦

近二十年来，随着晚清文学研究成为热潮，对民初文学的评价已然有所改观，但普遍视“清末民初”为整体，而对晚清到民初文学场域发生的变化

①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② 刘勇，现代文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17。

③ 陈国恩，文学革命：新文学历史的原点，社会科学辑刊，2007（1）。

④ 王德威，陈平原，夏晓虹等，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访谈，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4）。

⑤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⑥ 李杨，陈平原，“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⑦ 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20。

仍缺乏自觉地认识。正如陈思和所言：“长期以来文学史家通常把‘清末民初’视为一个板块来研究。而无意中往往强调了‘清末’而忽视了‘民初’。”^①并且与为晚清文学翻案相比，对民初文学的重新认识难度更大。至今，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依然在对晚清与民初两个时段历史图景的呈现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即晚清时尚有追求政治改良、宣传革命的文学，相比之下，民初文学走向娱乐化、放弃现实干预，因而被否定。^②纠缠其中的还有对辛亥革命的判断。因辛亥革命长期被视为失败，文学中放逐革命话语自然会受到批判。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民国建立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首要目标已经实现；甚至共和政体初肇，最迫切的任务并非继续革命，而是维护和建设来之不易的共和局面。正如郑逸梅在回顾南社时所言，南社中确有“一经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就认贼作父”的软骨人士，但“有的完全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一自清王朝垮台，认为重见汉官威仪，任务完成，一切的一切，就松懈下来了”。^③而身为后者的知识者实际相当普遍，清末革命的主导话语之一便是这种狭义上的民族主义。

即如鲁迅，在民国建立后亦不再坚持“革命”。1926年，他在《坟》结集出版时，曾对文言的《摩罗诗力说》表示敝帚自珍，“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④颇可玩味的是，正是“民国告成”使他忘却了他曾经热烈鼓吹的“精神界之战士”；而这些人再次浮现的时刻却要到了大革命时代。民初文学政治诉求的降低原本与其“共和语境”下的写作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

随着鸳鸯蝴蝶派研究的日新月异，民初小说确也部分地得到了承认，但大多偏重于文学的内部研究，无论是对民初小说“情欲”书写的肯定，还是

① 陈思和。一份填补空白的研究报告。见：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4。

② 这种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评价方式亦对海外汉学家有所影响，如李欧梵便认可了“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的看法，即“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一个‘低潮’阶段。而过去的10年是一个创造力旺盛的10年，这期间曾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并且产生出清末四大小说家”。见：李欧梵。第九章—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性（1895—1927）。[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96。

③ 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6。2。

④ 鲁迅。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

对其审美现代性的挖掘，抑或对其在小说理论、小说体制、翻译成就等方面的关注，均较为缺乏从外部环境的讨论。理解民初文学离不开对“共和语境”的探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晚清到民初的文学变革体现在从帝制到共和的语境转移。

在辨析了晚清与民初的差异性之后，需要继续考察民初之于“五四”的意义。确实，文学革命时期的诸多主张均可在晚清时代找到其思想文化资源，或是类似乃至更为激进的表达。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作为资源的晚清时期文学思想的文化价值，都不得不面对晚清时代没有真正发生文学革命这样的事实。究其根本，在于晚清仍处于帝制时代。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作为政治史方面的重要界碑意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说明，但其在文学史方面的界碑意义仍未被重视。已有研究者指出：

以往我们常常用“不彻底”来形容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特点，现在看来，无论彻底不彻底，辛亥革命毕竟完成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这就是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暨1912年开始了“民国”元年。如果从一场革命的思想价值来看，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但是从改朝换代的角度来看，不能说辛亥革命不彻底了，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开创民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是人们公认的，对于此点并无异议。但问题在于，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无论是近代文学史还是现代文学史，都找不到辛亥革命这样一场改朝换代的伟大革命的位置。^①

这种盲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②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起始的时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性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分期等方面的论述，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按照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崭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且是伴随着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相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的

① 刘勇：《五四新文学视野下的辛亥革命》，学习与探索，2011（5）。

②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初刊于《解放》第九十八、九期，1940年2月20日。

③ 《新民主主义论》“曾经作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指导性纲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见：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67～70。